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 经济发展思想*

——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

邹进文

摘要：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随着抗战的胜利，如何重建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工业化，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也成为海外经济学留学生博士论文关注的热点。当时求学西方，主要是求学美国的经济学的留学生，基于对中国抗战后经济发展的关注，借鉴西方前沿经济理论，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作了深入研究。这些成果不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们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在世界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最为突出的学术成就。

关键词：留学生 20 世纪 40 年代 经济发展思想

引 言

发展经济学是在全球已形成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并存格局时，欠发达国家如何推进经济发展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经济学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学说。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发展经济学形成于 20 世纪 40 年代。从世界范围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经济学家主要立足于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研究，很少有人关注殖民地国家及落后的农业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作者简介] 邹进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430073，电子信箱：zoujinwen196301@126.com。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批准号：21ZD079）阶段性成果。

因此,20世纪40年代以前只有经济发展思想,^①没有专门研究落后农业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经济学。当时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现代化问题,被划入了经济史学、社会学的范围。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及大战期间,西方仅有少量论著研究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1938年威廉·罗普克(Wilhelm Ropke)^②在《国际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L'industrialisation des Pays Agricoles: Problème Scientifique),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③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 (6—9月合刊)上发表的《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一文,1944年尤金·斯特利(Eugene Staley)^④出版的《世界经济发展》(*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ects on Advanced Industria*)^⑤一书,1945年库尔特·曼德尔鲍姆(Kurt Mandelbaum)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Industrialisation of Backward Areas*)一书。其中,曼德尔鲍姆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罗森斯坦-罗丹的《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都是对东南欧工业化问题的研究。

《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一文认为,东欧和东南欧存在“农业过剩人

① 谭崇台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发展思想最早出现于重商主义理论之中,在此之前的西方各国处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是一种静态的、循环流转的社会,难以产生扩张经济的客观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探索经济增长问题的思想是不可能出现的”(谭崇台,1993:10)。

② 亦有译为威廉·吕彼克。

③ 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 1902—1985),发展经济学先驱。出生于波兰,在奥地利维也纳接受传统教育。1930年移民英国,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47—1953年任世界银行研究部副主任。1953—1968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之后,一直任教于波士顿大学。1964年出版发展经济学名著《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

④ 亦有译为尤金·斯塔利。

⑤ 该书一出版就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1945年孔昭深将该书译为中文,在《经济汇报》分7期连载。上海《海光》杂志1946年第2—3期发表的署名为“圭”的《今后国际之新经济潮流(介绍Eugene Staley氏之看法)》一文,从“国际投资之重要”“国际投资之方式”“将来各国工商业应善于应变”“混合制经济体系”四个方面介绍了该书的内容。该文将Staley译为“斯塔雷”,认为其著作“是他对国际劳工局的一本报告,他这里所谈的主要是世界经济,而且是一种新的国际经济,很可能成为今后世界经济的趋势”。20世纪40年代中国留学生有关发展经济学的博士论文涉及外资方面时,大都将该书列为参考文献。

口”，数量为 2000 万—2500 万人，即在 1 亿—1.1 亿总人口中，约 25% 的人口处于失业状况，减少失业的任务很大一部分必须通过工业化来解决。工业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俄罗斯模式”，以自给自足为目标，在没有国际投资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另一种模式是保留国际分工优势，通过大量的国际投资实现工业化。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对东欧、东南欧国家来说，后一种工业化模式更可取，可以更迅速地推进工业化。罗森斯坦—罗丹特别强调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他以劳动力的培训为例指出，由于无利可图，私人企业家不愿意投资职业培训，但对于国家来说，“它是最好的投资”。罗森斯坦—罗丹基于外部经济理论，认为“基础产业”投资的乘数效应将导致进一步的工业化，因此，国内外的投资一开始就应该集中在“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在中国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这可能是发展投资的最佳开端”。罗森斯坦—罗丹也非常关注东欧、东南欧地区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形成问题，他认为这一方面依赖于引进外资，另一方面依赖于提高储蓄率进而提高投资率。罗森斯坦—罗丹本人在后来的研究文献中非常看重这篇论文，认为该论文提出了“四点创见”：“第一个创见涉及‘过剩农业人口’的问题”；“第二点创见是‘货币性’外在经济的概念”；“第三点创见是，在消费品工业建立之前，必须大规模地筹集大量的不可分割的社会分摊资本即建立起基础设施，因为私人的市场积极性不能及时地做到这一点”；“第四点创见强调‘技术性外在经济’，它不是由不可分性造成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适合性’造成的”。他指出，“这些创见虽然后来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但在刚公诸于世时却遭到许多非难”（迈耶、西尔斯，1988：212、213）。曾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经济顾问的德拉格斯拉夫·阿瓦拉莫维奇认为该论文“具有经典型”，并从七个方面总结了论文的主要观点：“世界萧条地区的工业化若想成功，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制度结构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诱导工业化，最小规模的社会分摊资本是必需的”；“工业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为使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提供训练”；“不同部门之间应当保持互补性，这是实现大规模有计划的工业化的最重要论点”；“在世界萧条地区基本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私人边际净产品和社会边际净产品之间的偏离并不很大”的假定是不真实的；“现有的与国际和国内投资有关的种种机构，并没有对以上提到的那种外在经济加以利用”；“为了从国际上吸引必要的资本流入，政府的保证是必不可少的”（迈耶、西尔斯，1988：232、233）。

曼德尔鲍姆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一书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和统计研究所联合委员会发起的一个广泛的国际重建问题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指出：东南欧人口过多、经济落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西欧蓬勃的工业发展几乎没有影响到这些地区，结果是福利和财富水平下降；他们目前面临的困境是人口增加，由于缺乏工业发展，这些人正被迫从事农业和城市生产率非常低的职业。作者进一步指出：人口压力、贫困和工业匮乏的恶性循环绝不局限于欧洲的这个角落，它也存在于其他欧洲国家，在远东地区最为明显；选择东南欧作为例子，部分原因是偶然的，部分原因是东南欧的物质条件比其他人口过多地区的物质条件略为丰富。该书内容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提供了落后地区工业化进程所需条件和机制的理论讨论；^①第二部分以东南欧为背景，定量分析了这一过程。^②作者假设一个工业化的速度可以吸收人口的自然增长和现有的剩余人口，例如一代人；考虑到该地区的自然资源，还假定该地区可能承担的特定发展。在此基础上，他确定了最初五年的资本需求，并得出了新兴工业部门的生产和需求结构。

罗森斯坦-罗丹和曼德尔鲍姆的上述论著，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西欧发达国家之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问题的研究。由于罗森斯坦-罗丹担任过世界银行的研究部主任，他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中提出的工业化理论不仅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于当时留学西方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代有关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及中国学者在西方发表的有关发展经济学的论文，多注意

① 这一部分为该书的第一章“工业化的经济问题”，内容包括：工业化的经济原因、工业化的需求因素、资金短缺、工业化方向、工业化与先进国家。

② 这一部分分为五章。其一为“目标和资源的临时分配”，内容包括：按劳动力计算的工业化率，劳动人口的地域分布，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工业和服务业、工业的主要分支、建设方案），按建设要求修订的工业劳动分配。其二为“新工业部门的产出”，内容包括：资本要求与劳动生产率的标准数字和生产计划。其三为“需求变动与生产调整”，内容包括：循环流的组成部分和方案，净产出的划分，经常账户需求（直接需求——支出预算、派生需求、经常账户总额），资本项目需求，总需求的大小和分布，需求流和生产流调整。其四为“最终模型”，内容包括：最终劳动力分配，地区和国际专业化津贴，生产计划，需求结构，供求比较，循环流动。其五为“结果、影响和结论”，内容包括：新的职业和产业结构，国民收入的计划增长，资本需求和内部储蓄，国外贷款，对外贸易，其他假设。

到了该论文。^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大洲广大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在经济上各自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使世界上出现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从国内社会经济特点看，还是从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看，这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与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面临着向工业化及现代化转型的艰巨历史任务。当时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落后的经济状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当时长期处于殖民地、附属国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文化教育的落后，还有待于培养自己的经济学家解决自身的经济发展问题。在此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或者是由于“富国对人道主义的关心”，或者是由于“输出鼓励的利益和大国势力的角逐”（谭崇台，1993：12），开始关注农业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发展问题。他们运用当时流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特别是盛极一时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② 发展经济学异军突起。

早在 1937 年，德国经济学博士、时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的朱偁就在德国杂志《世界经济文汇》（*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第 45 卷上发表《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需求》（*Die Allgemeinen Kapitalmäßigen Voraussetzungen für die Industrialisierung Chinas*）一文，分别从潜在的内部资本形成（通过改善银行组织而吸引储蓄）、通过信用创造的内部资本形成、新的投资问题（工业本身的融资和来自国外的融资）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资本形成问题。朱偁的这篇论文是目前所知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系统讨论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学术成果，堪称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随着抗战的胜利，如何重建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工业化等问题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也成为海外经济学留学生博士论文关注

① 比如张培刚 1945 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和吴元黎 1945 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办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落后国家和中央计划国家的战后工业化》一文，均将该文列为参考文献。

② 这方面最早的理论成果来自凯恩斯的门生，英国的罗伊·哈罗德（Roy F. Harrod）和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埃弗塞·多马（Evsey D. Domar），他们在 20 世纪 40 年代推演出一种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广受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包括当时留学西方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中国留学生的关注。

的热点。当时求学西方，主要是求学美国的经济学留学生，基于对中国抗战后经济发展的关注，借鉴西方前沿经济理论，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作了深入研究。这些成果不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们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在世界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最为突出的学术成就。

学术界以往有关民国时期发展经济学思想的研究集中于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①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海外留学生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博士论文中，张培刚的博士论文虽是其中的代表作，但有关研究成果远不止张

① 研究张培刚留学期间经济思想的论文主要是研究其对开创世界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成果主要有：陈坚的《张培刚和他的〈农业与工业化〉》（《今日中国（中文版）》1990年第8期），廖丹清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现实意义》（《江汉论坛》1991年第1期），蒋自强的《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理论》（《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徐长生的《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方齐云的《〈农业与工业化〉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经济学家》1996年第2期），张建华的《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中的系统论思想》（《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宋立中的《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学海》2003年第4期），王传宝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及其发展经济学思想述评》（《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7期），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5期），郭熙保的《张培刚对发展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张蓝水的《〈农业与工业化〉：农机化理论宝库——“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博士论文初识》（《农业工程》2012年第8期），邹进文的《〈农业与工业化〉——发展经济学的首创著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16日），孙大权的《张培刚学术与思想几个问题的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此外，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的第四章“南京政府后期（1945—1949年）的产业经济思想”的第三节“张培刚的产业经济思想”，从产业经济学研究方法、产业结构思想——工业化理论、产业关联思想——农业与工业的联系三个方面解读了张培刚的博士论文。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工业化思想》（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的第五章“工业化建设的影响因素”的第三节“工业化的影响因素论——兼论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对张培刚博士论文的经济思想作了分析，“在介绍其分析方法和基本概念创新的基础上，主要就其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论、工业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以上论著大多是从各个角度正面论述张培刚博士论文的学术贡献，只有孙大权在《复旦学报》发表的论文质疑张培刚的博士论文是否提出了“农业对工业化四大贡献理论”和“《农业与工业化》的工业化定义有没有重视发展农业的思想”。此外，张培刚本人还发表了《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概述》（《开发性金融研究》2015年第1期），对《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作了解读，解读的主要内容后被写进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教材。

培刚一人的博士论文。

除张培刚之外，当时中国还有多位留学海外的经济学博士致力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据 1945 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王念祖回忆，当时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经常召集例会，“主要是为成员们提供博士论文的初期成果”，由于讨论会的成果丰硕，哈佛大学留学生还“说服了华美协进社出版一本战后如何重建的论文集”。王念祖的博士论文也“主要是希望对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有所助益”，他“很早就感觉到，诞生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那时虽然有若干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文献，但尚无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他认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美国战后经济萧条“是伴随着长期不景气的趋势和战后有效需求急剧下降的”，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是经济萧条而是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必将以扩展货币的手段刺激工业化”（王念祖，2002：50、51）。因此，他的博士论文《工业化、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研究》致力于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内容包括：工业化时代，工业化的概念，工业化的水平、阶段和速度，资本、货币和储蓄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强制性储蓄工具。

与张培刚、王念祖同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丁忱亦致力于工业化问题研究，他在著名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 Hansen，1887—1975）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1883—1950）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工业化、资本积累和国内投资》。该论文内容包括资本形成过程、工业化与充分就业、工业化与人口增长、银行信贷的扩张、作为增加储蓄的税收，及进出口对工业化的影响等方面。

1947 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的辛膺与张培刚相似，出国以前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农业经济问题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密歇根大学学习期间又系统学习了西方前沿经济理论，特别是得到时任密歇根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著名汉学家查尔斯·雷麦^①等的

① 查尔斯·雷麦（Charles F. Remer，1889—1972），著名汉学家，1913—1924 年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学教授，并成为该校经济系首任系主任。他致力于中国国际贸易及国际收支问题研究，著有《中国经济读本》（*Reading in Economic for China*，1922）、《中国对外贸易》（*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1926）、《中国抵制行为研究：特别关注其经济效果》（*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Economic Effectiveness*，1933）、《外人在华投资》（*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1933，商务印书馆 1953 年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等著作。

指导。辛膺选择了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完成了博士论文《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理论》，其内容包括五个方面：流量经济的扩张、劳动力的转移、资本结构的深化、投资类型和政府的经济政策。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吴元黎也致力于后进国家的工业化问题的研究。他1946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题为“资本形成与经济秩序：一个关于贫困国家案例的研究”。吴元黎的博士论文集中讨论资本形成问题，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有关发展问题讨论的核心主题，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第一阶段的基础。按照当时西方流行的发展理论，不发达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要构建资本形成的体制机制，促进资本形成。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不能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必须进行必要的干预。正是基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强烈关注，吴元黎运用西方的资本形成理论分析了落后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变革促进资本形成，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他的博士论文是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其中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此前，他于1945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办的《经济学》(*Economica*)杂志上发表《落后国家和中央计划国家的战后工业化》(A Note on the Post-war Industrialisation of “Backward” Countries and Centralist Planning)一文。1946年，他又在《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国际资本投资与贫困国家的发展》(International Capital Inves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ol Countries)一文。吴元黎上述博士论文和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都是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

除了上述专题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之外，20世纪40年代中国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中还有多篇论文涉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呈现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蓬勃发展趋势。

本文将主要从工业化的概念、工业化与资本形成、国际资本流动、工业化与农业、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中国的工业化、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全面、系统研究20世纪40年代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经济思想，充分展示中国留学生在这一领域取得的立于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学^①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① 中国经济发展学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学说，易棉阳、赵德馨(2017)提出以中国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发展现状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并提出了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具体思路。

一、工业化的概念

工业化起步于 19 世纪 60 年代，西方先发工业国正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落后的农业国要实现工业化，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工业化、工业化有什么特点。对此，王念祖、张培刚等留学生在他们的博士论文中作了探讨。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王念祖^① 1945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工业化、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研究》的第二章，重点讨论了工业化的概念。工业化在 20 世纪 40 年代已是非常流行的概念，正如王念祖所指出的，“在最近的出版物和演讲中，工业化这个词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分析与该术语所暗示的基本相同的现象而使用一个新的其他词汇对公众来说是过分迂腐的”。他认为人们当时对于“工业化”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不同的含义，为此他试图“按照或多或少的逻辑顺序排列，考察工业化的各种含义”，以便重新定义“工业化”的概念（Wang, 1945: 21, 22）。

1. 工业与农业的二分法。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工业化是指从农业向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在极端情况下，它指的是农业年度产出、农业就业或农业人口的绝对下降。更一般的情况是指农业和工业（不包括农业）地位的相对变化，它可以通过农业在国民收入、就业或人口中的比例下降来表明”。王念祖认为以上工业化的定义“太狭隘”，他认为“在开放经济中，当贸易条件

^① 王念祖（Wang, Samuel Nien-tzu, 1917—2004），祖籍浙江慈溪，出生于上海，父亲为中国近代著名投资家王伯元。早年主要接受私塾教育，1937 年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1938 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深受该校银行系主任丹尼斯·霍姆·罗伯逊（Dennis Holme Robertson, 1890—1963）教授的影响，开始“对货币经济学感兴趣”。一年后转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41 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熊彼特、汉森、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 1906—1999）等著名经济学家，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46 年回国，先后任中央信托局专员、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商务处副处长、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行政院输出管理委员会输出推广处副处长。1949 年去美，任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国际管理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员，世界银行顾问，联合国信息分析司司长、牙买加技术合作团团长、东非技术合作团团长。曾获纽约州亚裔杰出人士奖。王念祖晚年经常回到中国大陆访问不同地区，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并就经济问题建言献策。其著作有《发展经济与跨国公司》《中国的现代化与跨国公司》等。

或自然资源特别适合于农业时，农业国可以比工业国发展得更好”，“农业和工业的二分法忽视了采掘业、流通业、金融和其他服务业等其他重要经济活动领域”（Wang, 1945: 23）。

2. 电力利用、机械化、化学化和电气化。有人主张以能源利用的类型，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煤时代或电力时代”。有人认为机械化是工业化的核心，也有人认为化学化“无限地拓宽了原材料和成品的资源范围”，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王念祖指出：“电力、机械或化学这三个方面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其他重要因素被遗忘”，用以上三种概念的任何一种来定义工业化都是有局限的（Wang, 1945: 24, 25）。

3. 技术生产系数。有人主张，“将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强度相对于整个经济的反映结合起来定义或衡量工业化”。王念祖认为这种定义方式“太过粗糙，不能处理所有类型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忽视了企业家的作用。他指出，“生产系数的变化，正如经济学家所熟知的，可能是由于企业家通过将一生产要素替换为另一个生产要素以不断适应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引起的”（Wang, 1945: 26, 27）。

4. 组织。王念祖认为，“纯粹的技术特征没有强调管理和合作的作用”，事实上，劳动分工的扩大、工厂制度的建立、横向联合、纵向一体化，以及科学管理运动的推广等组织改进，“也被视为工业化的重要方面”（Wang, 1945: 27）。

5. 生产函数。王念祖认为，通过对工业化各种概念的辨析，可以发现，“建立新的生产函数”是工业化的最完整、最准确的定义，这个定义“同时包括机械、化学或组织进步的所有方面，而其他方面，如资本积累和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仅仅是与生产函数的变化有关，因此不应该包括在定义本身中”。他认为，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一是“引入新产品或因素，例如尼龙或股份公司，或新合金”；二是“生产函数形式的不连续变化（没有新产品或因素），如流水线上的生产”（Wang, 1945: 28）。

6. 生产函数的测度。在这方面，王念祖主要介绍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他认为，“生产函数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在任何生产和分配分析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生产函数的统计测量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认为“对道格拉斯主要工作的简要回顾将清除一些陷阱”（Wang, 1945: 34）。

7. 关于创新分类的说明。王念祖借鉴熊彼特的思想,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发明及其广泛经济应用的产物”,工业化是“建立某种新的生产函数”(Wang, 1945: 37, 38)。工业化带来劳动力和资金的节省,对此许多经济学家作了论述,王念祖主要介绍了其中的三种主要观点:皮古教授因素比(factor ratio)、希克斯-罗宾逊替代率、兰格的绝对边际生产率。

与王念祖同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张培刚在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亦讨论了工业化的定义。张培刚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整个社会”(张培刚, 2009: 65)。这一定义赋予了工业化广泛的内涵,它“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这个定义“能够防止和克服那些惯常把‘工业化’理解为只是单纯地发展制造工业,而不顾及甚至牺牲农业的观点和做法的片面性”(张培刚, 2009: 4)。

按照这一理解,张培刚认为,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不仅可以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如英国、德国等),也可以是农业和制造业均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日本、丹麦、意大利等),还可以是以农业为主的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大多把“工业化”片面理解为单纯地发展制造业,而将农业的进步排斥在工业化之外,把实行工业化和发展农业看作是相互对立、不能同时进行的。

王念祖和张培刚关于工业化定义的全面梳理和深入思考表明,中国经济学者认识到了工业化问题的复杂性,这为他们探讨农业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开阔的视野,避免了那种把“工业化”片面理解为单纯发展制造业而忽视发展农业,甚至牺牲农业的倾向。

二、工业化与资本形成、国际资本流动

20 世纪 40 年代的发展理论是围绕经济增长展开的,而要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必须将获得的资源的一部分转向增加资本存量,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出水平。当时的哈罗德和多马的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形成率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他们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的发展经济学中具有重

大影响。“资本形成的重要性依次地深含在广泛的思想环境中，影响了战后初期几乎所有的经济发展思想。”（阿恩特，1999：64）值得注意的是，哈罗德和多马主要探讨的是发达国家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受其思想的启发，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主要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形成问题。

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丁忱^①在其博士论文《工业化、资本形成和内部积累：战后中国工业化考察》中认为资本短缺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该论文主要以中国为个案分析了工业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论文的第二章“资本形成过程”分析了资本形成的经济过程，讨论了资本形成的形式和促成资本形成的经济力量，其主要内容包括资本的深化与扩张两个部分。丁忱主要引述英国经济学家拉尔夫·乔治·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1937年出版的《资本和就业》和同样是英国经济学家的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1941年出版的《资本的纯理论》两书的相关内容，阐释资本深化与资本扩张的概念：“每单位产出增加所需要增加的资本被称为资本形成的‘扩张’，产出增加而资本形成却没有增加（降低成本的过程）被称为资本的‘深化’。”（Ting，1945：9）丁忱认为，霍特里将资本形成分为深化型和扩张型两种类型对发展中国家更有解释力，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结构仍然非常原始，技术变化不明显。

^① 丁忱（Ting，Chen，1919—2011），字宝恂，江苏无锡人，1935年毕业于无锡辅仁中学后考入交通大学学习管理，1939年7月毕业于交通大学管理专业，后在浙赣铁路车务段任职，发表多篇运输经济学方面的论文。1941年被派往美国当时最大的铁路营运公司圣太非铁路公司学习铁路管理。次年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专攻经济学，主要研究工业化资金积累问题，1943年获硕士学位，硕士论文题为“中国战后工业国的资本问题”（Capital in China's Post-War Industrialization）。之后转入哈佛大学经济系，师从汉森教授和熊彼特教授，继续从事中国工业化资金积累问题的研究。1945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供职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纽约办事处，1946年夏回国，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及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翻译了大量有关经济发展方面的资料。1947年任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申新二厂、五厂的秘书和总稽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处长、处长、副秘书长、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董事、副监事长，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驻美总代表，上海工商学院（1985年由中国人民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合办的民办大学）院长，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1. 资本形成的深化过程。丁忱认为，资本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指引下，只要资本边际回报超过借贷边际成本，“资本形成的过程就会继续进行，因为它会给投资者带来额外的收益。但是，如果说资本的边际收益或边际利率等于借贷的边际成本或边际利率，那么资本就没有得以‘深化’”（Ting, 1945: 13）。因此，“资本的深化必须更加依赖于低成本的借贷。增加储蓄供给，改革信贷结构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Ting, 1945: 22）。

2. 资本形成的扩张过程。丁忱介绍了汉森、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和埃里克·菲利普·伦德伯格（Erik Filip Lundberg）等提出的资本扩张的动态理论。他将资本的扩张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诱发型资本扩张，这种“资本的扩张可能是由自发的或者外生力量引起，比如人口的增长、新消费需求的突发等等”；一种为自发性资本扩张，这种资本扩张是“由投资增长导致的净消费增长引起进一步的资本扩张”（Ting, 1945: 23）。

1946 年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吴元黎^①在其博士论文《资本形成与经济秩序：一个关于贫困国家案例的研究》中集中讨论了资本形成问题。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不能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

① 吴元黎（Wu, Yuan-li, 1920—2008），祖籍四川，民国政要、曾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吴鼎昌之子。1933 年随父母迁居上海，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入圣约翰大学攻读。1938 年赴英国留学，1942 年本科毕业，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一等荣誉学位。之后继续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1946 年再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得到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指导，同时学校为他配备了两名鼎鼎大名的副导师：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 1908—1986）和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 1915—1991）。吴元黎回国后担任中央银行研究员，积极参与了当时中国战后经济重建方面的讨论。发表了《论中央计划经济》《现代经济思潮的趋势》《中国的经济政策：计划还是自由企业》《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等论文。1949 年移居美国。曾任旧金山大学经济系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国防部助理次长，主要从事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经济研究。主要英文著作有《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考察》（*An Economic Survey of Communist China*）、《共产党中国的经济》（*The Economy of Communist China*）、《中国手册》（*China: A Handbook*）、《战略陆脊：北京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The Strategic Land Ridge: Peking's Relations with Thailand,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和《1997 年及以后的香港未来》（*Future of Hong Kong toward 1997 and Beyond*）等二十多种。中文著作有《中共国际经济政策：现代化和开放的探索》、《海外华人与东南亚的经济发展》、《美国华人经济现况》，及《华人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他的著作有多种被译成中文、英文、法文、德文和日文。他曾荣获 1985 年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奖。

必须进行必要的干预。正是基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强烈关注，吴元黎运用西方的资本形成理论分析了落后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变革促进资本形成，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他的博士论文是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文献，特别是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开创性。

该论文的第一部分为“资本形成的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这一部分讨论了资本形成理论，特别论及资本类型的选择，以期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福利。文中特别论及原本贫穷与落后的不发达经济体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发达的工业国，需要大量投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根本区别是工业生产需要购置大量设备，而农业生产与工业相比，资本的密集度要低得多。因此，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总是需要大规模的资本积累。论文的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简单的资本形成和复杂的资本形成两个方面的内容，共4章：“简单的资本形成（一）：设备建设的投入大小和建设阶段”“简单的资本形成（二）：持续的、初始的与当前的投入”“复杂的资本形成（一）：生产的资本结构：耐用设备和竞争”“复杂的资本形成（二）：经济发展的动态”。

1. 简单的资本形成。资本形成是一定时期内资本资产（厂房、设备、车辆等投资品）的净投资，简单资本形成主要是基于资本资产投资方面的数量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

2. 复杂的资本形成。复杂的资本形成是从边际效用考察资本结构，讨论市场竞争对资本分配的作用，分析动态的经济发展中资本结构的变化。

广义的资本形成还包括国际资本流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潘玉璞^①在其博士论文《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本形成》中对此进行了探讨。该

① 潘玉璞 (Pan, Yu-pu, 1914—?), 辽宁奉天 (今沈阳) 人, 中国台湾地区著名作家李敖岳父胡康年前妻。1925—1928年在奉天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中学部学习, 1934年考入国立东北大学理工学院学习, 1938年取得理学士学位, 随后两年留校工作。1940年考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四期统计专业研究生, 毕业后留在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45年3月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1946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硕士论文题目为“利息理论的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heory of Interest)。1948年在布洛杰特(R. H. Blodgett)教授指导下, 完成博士论文, 获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参加联合国工作, 任统计部主管, 负责生活指数统计, 后任联合国经济顾问。1978年5月从联合国退休以后回国定居, 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 主要从事消费物价指数编制方面的研究。1979年当选中国统计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988年任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副会长。

文结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形成来论述国际资本流动对资本形成的影响。

潘玉璞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是指各种形式的资本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转移，该文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引起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经济原因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利率差异，这足够超过由对资本流动的障碍引起的转移成本。国家之间的利率差异通常是由资本生产率或投资的边际效率不同形成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的数量及其他要素的数量”（Pan, 1948: 6, 7）。国际资本流动原因的利率差异说在西方学术界早就有学者提出，如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 1826—1877）所著的《经济研究》（1880 年出版）一书就认为，由于“利率的诱惑”，“全球信贷资金”便无处不在。20 世纪初，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 1851—1926）将利率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进一步细致化，指出“提高利率以后，不仅有利于吸引国外资本流入国内，而且还会使投资于外国有价证券的国内资本取回”（李成、郝俊香，2006）。潘玉璞在借鉴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利率的决定因素，认为利率差异是由投资的边际效率决定的，而投资的边际效率又由投资的数量及资本的使用技术决定。

国际资本流动并非简单地获取利率或是投资利润，还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规避、个人投资偏好等。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 1903—1983）在 1932 年发表的论著中就认为，资本可以从利率高的欠发达国家流动到利率低的发达国家，即资本外逃，其动机主要是为了规避本国的风险，而非获取国外的高额回报。潘玉璞在其博士论文中也注意到国际资本流动的这一现象：“另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原因是资本外逃。资本外逃要么是由对货币贬值的担忧和政治不稳定引起，要么是由高额税收引起。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将从边际效率高的地方流向边际效率低的地方，这样做的原因是回避风险而非寻求更高的回报率。”潘玉璞认为，“资本外逃”会产生破坏性的效果，“随着资本外逃，生产必会萎缩，国民总收入将下降。除了减少资本家收益这一直接后果之外，也会降低总工资和租金。而且，资本外逃将加剧资本匮乏，提高利率”（Pan, 1948: 7）。她还认为，资本外逃也不会给流入国带来任何好处，虽然流入国短期因获得流入资本而可以扩大生产规模，但“外逃的资本常常在它刚刚流入就离开资本流入国。流动资本的突然离开短期将提高利率并使经济、贸易、收支失衡”（Pan, 1948: 7）。

潘玉璞认为，从理论上讲，国际资本流动将用两种方式通过增加国民收

人来加速资本形成：“首先，如果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债务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直接增加了储蓄数量；其次，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对资本和劳动的更大需求，这将使国民收入和储蓄更进一步增加。”（Pan, 1948: 6）

最后，潘玉璞从总体上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资本形成的影响，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对债权国与债务国的未来资本形成有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而且直接通过国内经济的反应的方式体现出来”。那么，如何评判国际资本流动的效率呢？她认为其评判的标准是比较资本流出国和资本流入国的资本相对生产率，“借贷国之间资本的相对生产率是衡量这种流动效率的标准”。“从长期来看，最成功的国际借贷是基于经济原则的。国际贷款不一定意味着贷出国生产力的降低，也不一定意味着贷款国生产力的增加。这取决于太多的因素，一般性的研究只会带来一些亮点，在特定的情况下需要具体的研究。”（Pan, 1948: 15）

张培刚在其博士论文中也注意到了国际资本流动问题。他认为，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个主要的生产要素中，土地“在国内及在国家之间，均不能移动”，劳动力“在国内能完全移动，而在国家之间几乎不能移动”。因此，“在国际上能够移动的唯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尽管资本的移动也有各种限制和障碍”。而资本在国际间移动“总趋于从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移至较不发展的国家，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后一类国家较在前一类国家为高。这种资本移动大致与资本从工业国到农业国的移动相同，因为除了少数例外，农业国家一般在经济上总是比较不发达的或不够发达的”（张培刚，2009：201、202）。

此外，1947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桑恒康^①在哈佛大学著名

^① 桑恒康（Sang, Heng-kang, 1915—1997），河北故城人。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获得学士学位，194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硕士论文题为“资本形成之理论的研究”。1944年赴美国留学，1946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47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资本形成机制》（The Mechanism of Capital Formation）就是在其南开大学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同年被聘为联合国秘书处经济事务干事，从事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规划工作，主要掌管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交通运输和公共工程的筹划、评估和执行事宜，被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运输经济学的权威专家”。兼任美国圣若望大学、新泽西理工学院客座教授，1978年从联合国退休以后多次来中国讲学，1985年被聘为南开大学客座教授，1987年任南开大学交通经济研究所所长。著有《中国的交通运输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投资项目评估》（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著作。

经济学家熊彼特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资本形成机制》，该论文对资本的纯理论作了系统研究。^①“资本”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使用，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则见仁见智，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分析，“‘纯粹的资本理论’很少成为论文的主题”。桑恒康的博士论文将资本分为作为物质商品的资本、作为财产权的资本、作为价值基金的资本和以时间为本质的资本四种类型，“通过建立资本的基本概念入手讨论资本问题，然后借助概念工具，探索资本的存在所引发的关系”，系统梳理了学术界有关资本的理论观点，“以综合的方式填补这一空白”（Sang, 1947: 2）。论文除导论外，共分 12 章：“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四种类型”“资本的四个方面”“储蓄—投资过程的四个阶段”“根据资本的四个概念定义的经济体的循环流动”“资本的数量和生产力”“从实物的角度看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古典理论的两个两分法”“从货币的角度看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从产权的角度看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从时间的角度看储蓄与投资的关系”“结论”。总体上，论文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资本概念的探讨，第二部分是资本形成机制的探讨。

民国时期的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在资本形成与经济的关系方面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资本形成机制，从纯理论上填补了相关学术研究空白；二是首次全面将资本形成理论具体运用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分析中，改变了以往西方经济学家运用资本形成理论分析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局面。

在西方经济学家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 1907—1959）致力于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研究。在 1953 年出版的《落后国家的资本形成》（*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一书中，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限制了其资本形成，从而进入“贫困恶性循环”。从世界经济发展思想史的角度看，早在纳克斯之前的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的经济学留学生就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作了系统研究。

① 在博士论文的“致谢”中，桑恒康深情地写道：“我深深地感谢熊彼特教授，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他的耐心指导和激励性批评，极大地帮助我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他亲切的鼓励一直是我灵感的源泉。”

三、工业化与农业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培刚^①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

张培刚认为，任何时代农业和工业之间总保持一种密切的相互关系。“那种认为经济史中某一时期是农业的，某一时期是工业的说法，的确是太简单而笼统了。”（张培刚，2009：21）他在论文中考察了农业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五大贡献。

第一是粮食。张培刚认为，只要人类的食粮仍是以动植物为主，农业将依然是供应粮食的主要源泉。他从人口与粮食、粮食与经济活动的区位化、收入与粮食的需要三个方面说明农业与工业的关系。

第二是原料。原料是农业与工业发生联系的重要因素。张培刚认为，农业是供给原料的产业，而工业是原料的需求产业。他从两个方面讨论了二者的关联：一是农业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二是农业与工业区位的关系。

第三是劳动力。张培刚分析了人口的职业分配，特别是在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分配。他认为，虽然劳动力可以在农业与工业之间互相移动，但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当技术变化显著时，劳动力从农村移动到城市的状况最为明显。此外，生产的季节性和经济的周期性也会带来劳动力的流动。比如经济萧条时期“许多来自乡村的工人”，“不得不回到原来的职业，大多数是回到农业”

^① 张培刚（Chang, Pei-kang, 1913—2011），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9年春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次年秋预科毕业，进入经济系本科，1934年6月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被选送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先后撰成并出版《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的粮食问题》和《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三本著作，并在《独立评论》等刊物上撰文参与了当时学术界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辩论。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工商管理”门，同年9月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工商管理学院，次年转入文理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1943年通过硕士学位考试，取得博士论文撰写资格，在约翰·布莱克（John D. Black）和阿博特·厄舍（Abbott P. Usher）两位教授的指导下，1945年10月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年底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次年1月，参加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美国技术考察团工作，协助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研究中国的国民收入问题。同年回国，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1949年再度回国，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和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张培刚, 2009: 54、55)。

第四是作为买者和卖者的农民。张培刚运用了当时新问世的不完全竞争理论, 分别分析了农民以买者姿态出现的市场和以卖者姿态出现的市场。当时的经济学界一般仍然假定, 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只存在于工业市场, 而农业市场则是完全竞争或近于完全竞争的形态。针对这种看法, 张培刚分析了农业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他认为, 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是弱势群体, 在以买者姿态出现的和以卖者姿态出现的两个市场中都处于不利地位, 深受垄断之苦。

第五是资金积累。张培刚认为“农业可以通过输出农产品, 帮助发动工业化”。他以中国为例指出: “几十年来, 桐油和茶等农产品曾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输出项目的第一位。这项输出显然是用于偿付一部分进口机器及其他制成品的债务。”(张培刚, 2009: 195)

1946 年, 张培刚任职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与当时应邀担任顾问的美国经济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S. Kuznets, 1901—1985) 一起研究“中国的国民收入统计”和“农业机械化”问题。此时的库兹涅茨仔细阅读了张培刚的博士论文的英文底稿, 库兹涅茨于 1961 年发表了《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 从产品贡献 (包括粮食和原料)、市场贡献、要素贡献 (包括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 以及国内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而获取收入的贡献等方面, 提出了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所具有的贡献。

1984 年, “印度经济学家苏布拉塔·加塔克 (Subrata Ghatak) 和肯·英格森 (Ken Ingersent) 在他们合作撰写的《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的第三章‘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里, 完全承袭了库氏的上述观点, 并把它誉为‘经典分析’。他们还把库氏没有明说的最后一条定名为‘外汇贡献’。这样便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近年来常常引用的‘农业四大贡献’”(胡坚, 2013: 100、101)。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库兹涅茨、加塔克和英格森的分析与此前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中的论述如出一辙, 他们在其文献中大量借鉴和引用张培刚的文献而不注明来源, 是对中国经济学者的极大的不尊重。

除了研究农业对工业化的影响, 张培刚还研究了工业中的生产技术变迁对于农业改良、农业生产组织 (农场)、农业机械化、农作方式与农业在整个

经济中的地位等方面的影响，这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有关工业反哺农业的系统论述。

关于工业化对农业改良的影响，张培刚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认识工业发展与农业改良的关系。一是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二者的关系。产业革命以前，农业改革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产业革命以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二是要分清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就长期言，农业的进步必然是工业发展的结果”，若基于短期的分析，则工业发展对农业具有负面的影响。三是要对农业技术的性质和内容有正确的认识（张培刚，2009：112、113）。

张培刚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当作生产单位的农场在内部结构上会发生变动。他基于三种不同的假定条件对此进行了分析，除了纯粹的理论分析之外，张培刚还“从历史的和统计的记载中，来了解在工业化过程中，农场内部组织方面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变化”（张培刚，2019：119）。

张培刚认为农业机械化的方式包括三类：动力机的采用、现代交通工具被应用于乡村区域、改良的和较大的农具的采用和推广。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机械化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机械化对于役畜的影响，特别是应用动力机械和机动货车对于役畜的影响；机械化如何提高每亩的生产力和每个“人工小时”的生产力；机械化对于农场面积大小的影响。

张培刚认为，工业化过程中收入的增加、饲料作物的改变，以及粮食作物转换工业原料，都会引起农作方式的重新定向。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由于农产品市场的扩张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农业生产的总产量和亩产量必然会增加，农业生产规模亦必然会有所扩大。但是，受土地总供给量固定不变、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低和农产品生产受自然规律的制约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必然较工业的增长速度低。因此，尽管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农业生产在绝对数量上和规模上史无前例地不断扩张了，但是农业生产总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或比重下降了。

张培刚关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关系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论述，与民国时期中国国内在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之争中，片面强调工业或片面强调农业的思想相比，更加全面和深刻。

四、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

20 世纪 40 年代的发展经济思潮的主流观点是结构主义，主张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推进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形成，建立起国家的工业化体系，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对此，中国早期发展经济学留学生博士论文大多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丁忱强调通过强化中央银行职能和税制改革促进工业化，他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中央银行，“中国需要建立一个负责任的中央银行，随着工业的发展，中国中央银行面临的艰巨任务将变得更加紧迫”。在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中央银行主要承担两个方面的职能：一是“保持合理程度的流动性，以便在不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促进扩张”；二是“应对国内扩张可能造成的外汇不利局面”（Ting, 1945: 172）。在税制方面，他基于扩大储蓄进而有利于资本形成的视角，分别分析了所得税和消费税的最佳征收方式。由于累进所得税对资本形成不利，丁忱认为可以实行比例所得税，而不是累进所得税，他认为大约 16% 的统一所得税率可以使公共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提高 2%，从而为部分公共产品投资提供资金。

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辛膺^①在其博士论文《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理论》中重点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问题。他认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干预，特别是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国家，面对资本及各方面

① 辛膺（Hsin, Ying, 1915—1995），江西抚州临川大岗人。1934 年考入北京大学，1938 年北京大学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大。辛膺于 1939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图书合作社做编辑，一度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处研究员，后来被国民政府委任为中央银行西南特派员。1945 年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经济学，1947 年获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1949 年 9 月去香港。在香港期间，发表了多部学术著作，其中，《中共统治下的物价问题》和《中共的对外贸易》两书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1959 年移居美国，先后在德克萨斯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以及他的母校密歇根大学担任经济系教授。其间，他非常关心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于 1960 年、1975 年、1976 年三次致信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中国的山脉、江湖、水库的发展和引灌提出建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积极改革开放，辛膺先后于 1981 年、1983 年和 1987 年归国访问。1995 年 5 月，辛膺回国探亲期间不幸中风辞世。

条件的匮乏，发展经济必须依赖国家的力量。他讨论了政府经济政策对工业化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工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公有与私有企业的优劣三个方面的问题。

1. 政府经济政策对工业化的重要性。辛膺认为国家控制和直接参与工业的局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政府的力量不仅是为了革除市场经济发展自有的弊端，同时也是为了充实国家正常运转所需的财政收入。尤其对于不发达国家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其工业化起步中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在国家引导本国产业的发展上，辛膺并未一味照搬西方经济理论，而是主张各国应根据本国的国情规划产业结构。一国若耕地广阔，国家在农业发展上更具优势，那么以农立国更能刺激其经济的繁荣；一国若耕地不足，但除耕地以外还有其他相对丰富的未开发资源，那么尽管该国可能面临严重的粮食供应不足问题，相较而言，从事工业发展也许更好。

在宏观调控手段上，辛膺主张政府使用经济手段，通过适当的财政、货币、商业和税收等政策，以引导经济的发展。自然利率（储蓄和投资相等时的利率）以及市场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适当的货币政策来降低或提高。货币政策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从而调节利率，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因为证券的价格与利率或折旧率相关，高的利率或折旧率会使证券的价格偏低，进而抑制工业投资，所以货币政策会对经济活动造成深刻影响。货币当局采取歧视性利率政策可以鼓励工业贷款筹资，货币政策对汇率变动的调节会影响进出口产业的发展，货币政策的宽松或紧缩也与一国的就业水平等指标有关。

此外，财政政策也会影响工业的发展。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可能会激励某一行业的发展，但政府财政若仅以增收为目的，则一味与民争利将会阻碍或摧毁私人企业的发展。开明的财政政策，有利于工业发展的稳定和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比如，采用双重预算系统，即把当前的经营支出以及在资本或投资预算中的资本支出在经营预算中进行核算。再如，通过一个摊销周期，去确保一个周期中经营预算的平衡，或是设置周转资金以克服衰退期间的业务困难。所有这些实践都有利于发挥财政政策在推动工业发展上的积极作用。

2.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比较。辛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各有优缺点。资本主义制度由于缺乏国家的有效干预，会

形成周期性商业周期，经济波动大，而且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会造成贫富悬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虽然在经济效率方面有欠缺，但它“根据国家需求预先确定价格和产量”（Hsin, 1947: 110, 111），因而能够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会“改变财富的分配，减少或取消食利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可能共享经济进步的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在实现经济平等之后，才能实现其他领域的真正平等。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发展他的天才和个性。”但是在资源配置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优势，即“理性经济核算的不可能性和缺乏自由价格体系，会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的产出比资本主义经济的产出低”（Hsin, 1947: 110, 111）。

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缺点的认识，辛膺认为，应该找到一种综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优势的“均衡”的混合经济制度，“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是选择一种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缺陷，具有社会主义经济优点和存在经济核算的经济制度”（Hsin, 1947: 124）。均衡的经济制度的使用不是僵化的，任何一个国家究竟是更倾向于市场化配置还是更多依靠计划安排，都要随着本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3. 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比较。辛膺指出，当时主要有两种企业制度：一种是自由企业制度，其产业的选择由市场力量决定；另一种是受控制的企业制度，其产业掌握在政府手中。辛膺认为，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各有其优点，因此建立一个混合的企业制度，保留两者的优点，比建立单一的企业制度要好”（Hsin, 1947: 126）。辛膺还具体论述了何种产业适合公有企业、何种产业适合私有企业，及如何对公有企业实施管制等问题。

从总体上看，辛膺在经济体制与政府的经济政策方面具有调和性，他广泛借鉴了当时国际上有关国家干预的各种流行的经济理论，既认识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效率优势，同时也主张借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优点，试图建立一种综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的、“均衡”的经济制度。正如他在整理博士论文相关内容基础上撰写的、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经济政策与工业发展》一文所指出的，“国营与私营企业均有利弊。故去其弊而存其利，使二者共存，相互为用，以达到国民经济之合理发展，其为吾人追求之鹄的。倘同一工业适宜于两种企业制度之经营，即听其共存。相互竞争，可减少或避免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各种缺点。如习见之无效率以及资本与劳动之不合理支配等”（辛膺、《时代经济月刊》社资料室，

1948)。

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吴元黎也认识到政府的作用，他认为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的首要条件是拥有一个完美的自由竞争体系，但竞争性市场体系离不开公共管制，必须有必要的公共管制，才能使市场机制“不受各种不公平竞争手段的干扰”。此外，“那些在技术上无法实现自由竞争的产业，也需要由国家来管控”（Wu, 1945: 262）。吴元黎主要列举了政府投资的三个领域：一是“无法明确投资收益对象或收益量的事业”，如港口、灯塔等；二是“有些经济活动有赖于强制力执行”，如警察与军队的建立；三是“需要大量投资的产业”，这些产业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推进（Wu, 1945: 263, 264, 265）。

20世纪30—40年代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非常注重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当时的西方凯恩斯主义者的视野主要致力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并没有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当时留学英美的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运用西方流行的经济理论并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全面、系统分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从人类经济发展思想史的角度看，他们的有关经济思想具有拓荒性的学术价值。

五、中国的工业化

中国近代留学生基于对祖国工业化命运的强烈关注，在其博士论文中探讨了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吴元黎的博士论文《资本形成与经济秩序：一个关于贫困国家案例的研究》和丁忱的博士论文《工业化、资本形成和内部积累：战后中国工业化考察》。

吴元黎博士论文的第三部分“资本形成与合理经济秩序：一个具体案例（中国的工业化）”，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工业化。这一部分具体包括四章：“资本的稀缺性和工业化的其他问题”“战前的经济政策”“中央集权的规划与有序竞争：目前的争论”“通往合理经济秩序之路”。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战前的中国经济状况。吴元黎首先说明了选择中国作为资本形成与合理经济秩序理论应用分析案例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中国正在经历工业化

资本形成的初始阶段，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更有典型意义；另一方面这种研究具有现实价值，即“中国是一个主要的贫困国家，因而目前出现了一些最令人担忧的贫困问题”（Wu, 1945: 391）。接着，吴元黎以资本存量和国民收入为指标，分析了中国的贫困程度，其数据分别引自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卜凯（John L. Buck）、刘大中等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国民收入问题的中外学者的论著。吴元黎还分析了中国抗战前和抗战后的工业资本状况、一些工业化指标，及中国的铁路、公路、煤矿、铁石矿和棉纺织业的发展情况，介绍了中国的高利贷、税率、生产的资本结构、工业管理和市场机制的缺陷。

2. 中国的经济政策。吴元黎主要介绍了孙中山 1920 年提出的《实业计划》、铁道部长孙科 1928 年提出的十年计划、1929 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工业化计划、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1 年通过的经济建设六年计划，及中国战后工业化的十年计划。

3. 中国建立合理经济秩序的方法。吴元黎认为，中国建立合理的经济秩序，“可以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提高国内资源储蓄供给和来自国外的资本流入”（Wu, 1945: 513）。为此，他分别分析了当时中国国内资本的供给问题、引进外资问题。此外，他还分析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资本与土地所有权的平均分配问题、对外国经济力量的控制问题，及中国的经济计划机制问题。

吴元黎在获得博士学位的当年，将博士论文的第三部分精简、整理成一本 60 页的英文小册子《中国的经济政策：计划还是自由企业？》。^① 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②（Sino-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将其作为“中国国际经济丛刊”第 4 卷，在美国纽约出版。该书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陈伯敏在《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针对该书写的评论文章，指出：“本书在抗战胜利之后出版，这虽是一个小册子，著者吴元黎先生却将中国的实际问题在作精确的分析，和判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以后，提出他认为适当

① 该书分五章：“前言”“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经济政策的演进”“十字路口：国家社会主义与竞争”“中国经济政策重构的建议”。

② 该中心由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和中国农工银行共同发起，成立于 1944 年，并于 1945 年 8 月成为一家非营利性公司。

的经济政策。同时，对中国战前所行的或者具有计划而未实现的各种经济政策也有简洁的评述。”（陈伯敏，1948）

与吴元黎的博士论文专题探讨中国的工业化不同，丁忱的博士论文是在论述工业化理论中结合中国的案例进行分析的。如在讨论工业化中的投入与产出关系时，他首先介绍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P = f(L, C) = bL^k \cdot C^{1-k}$ ”。但丁忱认为这一函数对发展中的中国而言缺乏适用性，比如该生产函数关于劳动力和资本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投入了固定的比例的假定就不适合于中国，中国“资本将在生产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资本常数指数为 $(1-k)$ 的假定不现实”（Ting, 1945: 74）。

投资来源于储蓄，因此储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工业化过程中的扩张空间。丁忱对中外储蓄率的情况作了比较分析。他认为，“节俭是中国人长期珍视的美德，尤其是农村地区，家庭关系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储蓄”（Ting, 1945: 95）。丁忱估计，如果中国的资源储蓄率能够达到16%，那么中国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将可以达到4%的增长速度。他还指出，为了通过扩张资本进而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国内储蓄可能需要辅之以外国借款”，“如果有外国资本来源，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就可以继续以更快的速度进行”（Ting, 1945: 97）。

丁忱还专门探讨了工业化和人口增长问题，并以此作为该章附录。当时西方国家人口增长缓慢，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人口急剧增长，所以有学者认为亚洲国家的人口增长是独有的现象。丁忱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亚洲与西方人口增长“只是一种时间差异”。根据工业化国家人口增长的规律，丁忱认为，“在考虑中国人口的增长时，我们可以安全地假设未来几年生育率会下降”（Ting, 1945: 112）。丁忱的这一论断确实具有先见之明，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基于农耕文明时代人口增长的经验作出的，没有充分借鉴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增长的历史经验，更没有从丁忱等先辈的经济思想中吸取思想的精华。

抗战时期，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货币的边际效用相对于商品的边际效用大大降低，人们因此对储蓄失去信心，自愿储蓄不足。丁忱认为，中国战后自愿储蓄率难以达到国民收入增长4%所要求的16%的储蓄率。“为了弥补自愿储蓄不足，必须找出方法。”他认为有两种扩大储蓄的方法：“一种是扩大银行的信贷规模，另一种是税收。”（Ting, 1945: 112）

作为一个工业落后国家，中国的资本形成过程必然与引进外国资本设备

有关。丁忱主要从进口对工业化的影响、汇率、外汇管制和出口扩张四个方面，考察中国工业化的对外贸易政策。

丁忱回国以后在资源委员会工作，参与了中国工业化方面的政策设计与理论探讨，1948 年他在《新路周刊》（第 1 卷第 7 期）上围绕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大多是他博士论文提出的观点。

其他留学生博士论文亦或多或少论及中国工业化问题，如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讨论了作为农业国的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分析了中国工业化的两个不利因素。一是列强的侵略带来的国家的不完全独立。“自由港埠的开放，大城市租界的设立，对列强在我国内河航行权的承认，使外国工业产品，在它们原来由于大规模生产和现代销售组织就已经有了较低成本利益的基础上，更有了超越中国产品的诸种利益。有些国家运用倾销政策，结果使中国的情形更形恶化。而且，大多数外国货物享有只纳一次低额关税就可以自由地运到有运输设备的内地的各种便利，而国内货物从甲地运到乙地反而须缴纳多种关卡租税。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幼稚工业要想健康地成长起来是极其困难的。”（张培刚，2009：192）二是交通运输的落后及制度的障碍。“中国国内区域之间的关卡壁垒和运输工具的落后，是使商品和生产要素很难自由流动的另一障碍。它们已经长期阻止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化。这种障碍还抵消了本来可能进行农业改良的任何有利时机。”（张培刚，2009：192）

巫宝三^①1948 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资本构成和消费支出》第八章“中国经济进步模型”分析了中国经济特点及其面临的问题，论文运用投资与储蓄理论和国民收入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巫宝三建立了信贷扩张增加投资模型、通过税收政策增加投资模型、通过

① 巫宝三（Ou, Pao-san, 1905—1999），原名巫味芬，江苏句容人。1925 年入吴淞政治大学。1927 年入南京中央大学，1930 年转入清华大学，1932 年毕业后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33—1949 年先后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任助理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并任南京中央大学兼职教授等。其间于 1936—1938 年由中央研究院派赴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8—1939 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进修。1947—1948 年受美国罗氏基金会资助再度赴美，完成博士论文《中国的资本构成和消费支出》，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担任副所长、代理所长；兼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顾问。其学术活动和成就，大体上可以 1949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问题和国民所得问题的研究，后期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吸引外资增加投资模型和国民收入变动模型四种模型，以此“说明通过扩大投资可以增加消费、储蓄、收入及就业水平的可能性”（Ou, 1948: 5）。

中国国内学者早在清朝末年就展开过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民国时期国内学术界还出现过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但当时中国国内的工业化争论大多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撑，参与其中讨论的大多并非职业经济学家。海外留学生有关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运用了当时西方最新的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相比更具学理性和系统性。虽然这些研究成果由于受到中国当时国内政局的影响难以实施，但其思想价值直到当代中国仍然值得引起重视。比如，如果中国学术界能够关注丁忱的有关中国工业化与人口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那么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工业化过程中实施的人口政策就有可能更具前瞻性和科学性。

六、国际影响

中国近代有关留学生发展经济学方面的博士论文仅有张培刚的论文公开出版，因此国际上有关对中国留学生发展经济学博士论文的评论主要围绕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展开。

《农业与工业化》获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David A. Wells Prize）。威尔士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前国际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奖，张培刚是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获得该奖的中国学者。与张培刚同时获得该奖的是保罗·萨缪尔森，后者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当年，《珞珈学报》和《国立武汉大学周刊》都对此事予以报道并给予高度评价。^①《农业与工业化》被列入“哈佛经济研究丛书”第85卷，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英文本在美国再版。

^①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47年第366期发表的《张培刚教授荣获哈佛奖金》的报道指出：“经济系张培刚教授，前在美国哈佛大学所撰之博士论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为经济学上极有贡献之著作；近接其经济系主任 Prof H. Burbank 函告，业经该大学授予‘威尔士奖金’（The Wells Prize）五百美元；并选入‘哈佛经济研究丛书’（Harvard Economic Studies），由哈大出版部刊行。按东方人士在哈大获得此项奖金此为第一次；凡列哈佛经济研究丛书，咸称名著。”

该书出版以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反响。美国学者威廉·尼科尔斯、海曼·库布林、许烺光、奥林·斯科维尔、亨利·奥布里、格伦·T. 巴顿、威廉·W. 洛克伍德等在该书出版不久纷纷发表了评论文章，他们基于自己的知识背景，从各个角度评述《农业与工业化》一书，这些评论有的比较精准，有的并不得要领甚至存在误读。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时任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的威廉·尼科尔斯 (William H. Nicholls, 1914—1978) 于 1949 年 11 月在《农业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该书旨在探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调整的理论、实践及历史，特别关注农业内部的调整”。尼科尔斯认为《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结和综合了该领域的多方面文献”，“有助于对工业化和农业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二是“对中国工业化作了实证研究”。但尼科尔斯认为，张培刚的博士论文也有不足，主要是理论与实证并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都没有独创性，所有的结果都是“过于肤浅，带有学究气”，“没有充分展开论述”，“而且其实证部分的绝大多数资料、数据，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都是十分熟悉的”，“有些数据直接来自科林·克拉克的调查数据”。尼科尔斯特别期待张培刚加强对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认为张培刚仅简要地将自己的分析应用于中国的工业化，“他今后应致力于扩展他对自己国家工业化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期待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Nicholls, 1949)。

奥林·斯科维尔 (Orlin J. Scoville) 1949 年 11 月在《土地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针对《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评论文章认为，该书“在一个没有受到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足够重视的领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文章存在一些瑕疵，但其主要结论似乎是经过深思熟虑和有据可查的。他也许过分强调了工业化必须在农业改革之前开始。” (Scoville, 1949)

美国怀俄明大学的瓦斯 (A. F. Vass) 1950 年 1 月在《美国政治与社会学学会年刊》发表针对张培刚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认为该论文“旨在描述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调整”，“提出的问题非常有趣，但如果读者希望找到明确的答案，他可能会失望”。瓦斯认为，在比较中国与英国和日本的工业化时，必须注意到英国和日本可以从殖民地获得廉价的工业原材料、可用的电力资源和劳动力。瓦斯还认为张培刚博士论文中的参考文献和概念都来自美国学者，“很少是新的” (Vass, 1950)。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 (University of Manitoba) 的莫顿 (W. L. Morton) 1950年在《国际期刊》发表的针对包括张培刚博士论文在内的六部学术著作的评论文章,在论及张培刚的博士论文时,认为“经济学家将欢迎农业国家工业化时所进行的调整的学术研究,中国学者将感激西方工业化对农民和东方国家影响程度考察的尝试。作者认为,在人口密集的农业社会,工业化是农业改革和改良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Morton, 1950)。

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海曼·库布林 (Hyman Kublin, 1919—1982)^① 1950年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上发表的对于《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评论文章,肯定了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研究的学理与实践价值,特别提及了该书关于“工业化是实现农业改革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和“工业化分为演进型与改革型”的观点。中国工业化需要足够的资本,有必要吸引大量外国投资,张培刚在论文中认为可以引进美国投资。库布林发表书评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因此,他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美国投资于中国,需要以“美国人认为其政权足够友好并且可以长期执政”为前提,“根据共产党在中国的表现来看,人们只能认为,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投资风险较大”(Kublin, 1950)。库布林在书评文章中的这一引申显然超出了学理的范畴。

美籍华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许烺光 (Francis L. K. Hsu, 1909—1999) 1950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针对《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评论文章,囿于知识的局限,该书评并未从经济学的角度评析该书的学术观点。许烺光肯定了张培刚对于文献整理的贡献,认为“凭借对时下流行的经济学文献的高度了解,张先生至少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作出了一项巨大的贡献——将绝大多数与该主题相关的文献紧凑简洁地展现在一本厚度适中、可读性又较强的书中”。但该书评对于经济学研究,包括《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经济学“为了实现科学上的完美,为了简单起见而将复杂的现实武断而激进地进行简化”。许烺光认为,张培刚的博士论文也存在同样的缺陷:“作者在开篇时便认识到‘经济理论与经济的历史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他却显然没有尝试去弥补这样的‘差异’”;“他将经济学家的一般性结论应用于中国时甚至更加不尽如人意”。“阅读了整篇文章,笔者想起了一则被认为是来源于公元三世纪一位君主的历史轶事。

^① 亦有译为海曼·库柏林。

朝中一名大臣向他的君主报告说人民正在忍受饥饿。国王厉声说：‘为什么他们不吃肉呢?!’”(Hsu, 1950)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查尔斯·卢米斯 (Charles P. Loomis) 1950 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针对张培刚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称赞其对“非苏联和非西方工业化的分析”，认为其所涉及的主题“适用于任何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国家”。但卢米斯对张培刚博士论文大量运用西欧和美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概念来讨论工业化提出批评，认为“这本非常及时和有用的书的最大缺点是作者没有注意到他的参考框架的一些缺点”，如果作者“对极权主义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和历史有更好的理解，或许会有更现实、更中肯的发现” (Loomis, 1950)。

以研究日本经济发展问题著称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廉·洛克伍德 (William W. Lockwood, 1906—1978)，于 1950 年在《远东季刊》上发表了针对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评论文章。由于洛克伍德本身是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者，他对张培刚博士论文的评论是较为中肯和具有经济学学理性的。他首先指出了《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所研究的问题的价值。“工业化是当今亚洲每一个民族主义者和改革举措的一句口号，工业化在不发达国家的进展也受到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针对这一领域目前仍缺少深刻到位的分析”。“张博士关注的是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农业国家所发生的经济调整。他从分析工业中技术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农产品市场、农业原料市场、农业劳动力市场着手，然后将视角放到更为动态的视域——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逐渐展开的工业化进程之中。”“作者引用了大量西方的权威性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上详细阐述了这些一般性结论。张博士是一位勤奋的学生，熟读了大量文献，并针对该领域作了范围极广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将不会昙花一现。”作为一位研究亚洲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者，洛克伍德也对《农业与工业化》一书过多引用西方案例而较少引用亚洲案例，提出了批评：“令读者失望的是张博士对于西方经验的过多关注。几乎所有的数据证据都来自美国和西欧的历史，尽管东南亚的农业生产已经实现了广泛的商业化，作者却没有提及该地区。而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唯一实现了大范围工业化的亚洲国家，作者也很少予以关注。”洛克伍德认为，西方经验不一定适用于亚洲发展中国家，“二十世纪美国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及农业机械化与中国或者爪哇的农民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之道并非有很大关联” (Lockwood, 1950)。洛克伍德的这一分析应该说

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

专门研究发展问题的亨利·奥布里（Henry G. Aubrey）1950年8月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针对《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评论文章，特别肯定了张培刚博士论文有关工业化对农业的影响的论述。奥布里指出：“论文最具价值的一章是关于工业化对农业的影响”，“作者认为工业化是农业进步的一个必要前提，它为农业提供设备，支持并吸纳产出，同时工业化对交通的发展及社会制度的完善也是必不可少的”。“平心而论，张先生的这本著作不仅仅展示了他渊博的学识，随着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问题，该书对于任何一个有勇气去探索各种发展理论的学者都有其价值”（Aubrey，1950）。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农村社会学家霍布斯（S. H. Hobbs, Jr.）1950年在《社会力量》上发表针对张培刚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认为张培刚的博士论文的“中心主题是中国，核心要义是讨论中国经济从一个几乎纯粹的农业经济转变为一个更好的农业和工业平衡发展经济所发生的变化”。霍布斯高度评价了张培刚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认为该书“写得很好，可读性很强”，是有关农业国工业化的“第一次系统的研究”，“它给出了农业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调整的清晰画面。作者汇集了大量的经济理论和历史。这本书里提出了大量的问题。”霍布斯特别注意到了张培刚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认为“他的概念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因为它涉及到历史的变化”，“他的新方法不依赖于数学处理”（Hobbs，1950）。

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乔治·罗森（George Rosen）1950年12月在《社会研究》上发表了针对张培刚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他指出：“张先生在这本书中试图探讨经济发展问题。他对农业国的工业发展过程特别感兴趣，他决定回答四个问题，但不按以下顺序回答：在人口稠密的农村地区，工业发展是农业改革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反之亦然？在一个特定的国家里，能否保持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平衡？一个以前是农业国的国家的工业化对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哪些特别紧迫的问题？”罗森认为，张培刚的博士论文虽然考察了经济理论中的各种理论方法——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和区位理论，且特别强调了区位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概念在解释工业增长方面的价值，但论文在论述具体问题时，并没有运用好这些理论，以致许多结论“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Rosen，1950）。

1950年12月出版的《美国经济评论》第40卷第5期刊登了哈佛大学出

版张培刚博士论文的广告，指出该书“涵盖经济史与经济理论”，“首次系统研究了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工农业调整问题”。

格伦·巴顿（Glen T. Barton）1951年1月在《劳资关系评论》上发表的针对《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评论文章认为，“这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有序地整理和回顾了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涉及到的各种经济理论，这是一本有着丰富背景资料的著作，它非常适合指导像中国及存在类似经济问题的国家的研究”。巴顿认为《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主要不足是缺乏制度分析：“这本书似乎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关于制度的问题在该书中并没有进一步的分析，亦没有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而这正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但公平地说，这本书已经足够完整了，对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将需要一本乃至多本新的著作来说明。”（Barton, 1951）

《农业与工业化》一书1951年被列入“经济文化丛书”，由墨西哥著名经济学家埃德蒙多·弗洛雷斯（Edmundo Flores, 1918—?）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在拉美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1年弗洛雷斯还在西班牙杂志《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针对《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介绍性文章，他指出：“我们需要两个必要条件来实现农业革命：（1）一个规模可观的国家的工业化和（2）一般土地使用权和个别公司制度调整。两种因素发生的顺序可能不同，但不存在这两种因素，农业就不会演变成更高的形式，而是倾向于一种生存活动。由经济文化基金资助出版的西班牙语版本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无疑将成为拉丁美洲经济学家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张培刚研究了决定产业演进的因素以及农业国工业化的调整，它可以作为调整农业政策与工业促进政策的起点。”（Flores, 1951）

中国学者徐长生和林少宫亦于2003年在《亚洲经济杂志》（*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第14卷第2期发表《张培刚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Contributions of Chang Pei-Kang to Development Economics*）一文，评述张培刚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

当代美国学者保罗·特雷斯科特（Paul B. Trescott）200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英文版著作《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1850—1950》一书亦关注到了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并认为“这本书主要不是关于中国的；相反，大多数描述性数据涉及美国和其他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张的研究似乎更像是一种学术研究，而不是政策指南”（Trescott, 2007: 284, 285）。

200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迈克尔·费希尔（Michael Fisher）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出版60周年给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的贺函中说：“哈佛大学出版社很荣幸于1949年在《哈佛经济研究》系列丛书中出版了此著作。张教授的著作是该系列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此书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表如此具有深远与持久影响力著作的机会屈指可数。”（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2009：55）

《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后来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协会会长的威尔伯特·穆尔（Wilbert E. Moore）1950年在《密尔班克纪念基金季刊》第28卷第1期发表的《产业化利用人力资源》（Utiliz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through Industrialization）、亨利·奥布里（Henry G. Aubrey）195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主办的《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第18卷第3期上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小工业》（Small Industr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加西亚（A. García）1954年在《经济季刊》（*El Trimestre Económico*）发表的《哥伦比亚的农业和经济发展》（La agricultura y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en Colombia）、萨曼（A. R. Salman）1955年出版的《技术与垄断竞争下的劳动力需求》（*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mand for Labor under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达塔（B. Datta）1960年出版的《工业化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ization*）、罗伯托·埃切维里亚（Roberto P. Echeverría）1970年出版的《农产品价格政策对部门间收入转移的影响》（*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Price Policies on Intersectoral Income Transfers*）、保罗·辛格（Paul I. Singer）1971年出版的《人口动态与发展：人口增长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Dinámica de la población y desarrollo; el papel del crecimiento demográfico en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罗伯特·拉波特（Robert Laporte, Jr.）等1971年在《社会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第13卷第4期发表的《土地改革的概念及其在发展中的作用：关于社会因果关系的几点注释》（The Concept of Agrarian Reform and its Role in Development; Some Notes on Societal Cause and Effect）、利昂·斯托弗（Leon E. Stover）1974年出版的《中华文明的文化生态：最后一个农业国家的农民和精英》（*The Cultural Ecolog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easants and Elites in the Last of the Agrarian States*）、玛丽·亨德里克森（Mary Hendrickson）和哈维·詹姆斯（Harvey James）2005年在《农业与环境伦理学杂志》（*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第 18 卷第 3 期发表的《约束选择伦理: 农业产业化对农业和农民行为的影响》(The Ethics of Constrained Choice: How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mpacts Farming and Farmer Behavior)、马诺兰江·杜塔 (Manoranjan Dutta) 2006 年出版的《中国的工业革命和经济表现》(*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Presence*) 等论著, 均将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列为参考文献。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授业老师爱德华·张伯伦 (Edward H. Chamberlin, 1899—1967) 1956 年在《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第 70 卷第 4 期发表的《关于垄断竞争的第二补充书目》(A Second Supplementary Bibliography on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将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列入其中。

吴元黎的博士论文获得其导师哈耶克的高度评价。哈耶克在吴元黎的博士论文完成不久发给美国出版商的出版推荐函中指出: “本声明旨在为吴元黎先生提供服务, 向他可能决定接触的任何美国出版商推介, 以便出版他的《落后国家的资本形成》。吴先生在过去几年一直致力于这本书的写作, 并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在他不得不离开英国之前, 没有时间安排该论文的出版, 这是非常值得引起关注的。吴先生的研究在结合经济计划理论和经济不发达所产生的特殊问题方面开辟了一片处女地。我相信, 特别是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 专门讨论中国的问题, 第一次以欧洲语言提供了大量的新信息, 在未来的几年里, 这些信息将证明是非常重要的。我毫不怀疑这本书的学术水准, 它将提升出版它的公司或机构的信誉。” (Chu, 2003) 由此可见, 哈耶克关注到了吴元黎博士论文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面所作出的独创性贡献。

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 (Charles Wolf) 1955 年出版的西班牙文著作《欠发达地区的资本形成与外国投资》(*Capital Formation & Foreign Investmen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将潘玉璞的博士论文列为参考文献。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特雷斯科特教授 2012 年在《政治经济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杂志第 44 卷第 2 期发表的《凯恩斯主义如何传入中国》(How Keynesian Economics Came to China) 一文将哈佛大学博士王念祖的博士论文列为参考文献。

七、总结与评论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分支学科。20 世纪 40 年

代中国留学生所撰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博士论文，全面、系统地展开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① 这些成果第一次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纳入研究视野，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这些成果标志着世界发展经济思想由研究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转向重点研究不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重大转变，开创了经济发展研究的新时代，这是中国经济学人对于世界经济思想文明发展所作的开创性贡献，包括张培刚在内的这些早期中国经济学留学生是世界经济发展思想史上当之无愧的发展经济学之父（邹进文，2021）。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留学生有关经济发展方面的博士论文除了张培刚的博士论文之外，都没有公开出版，因而大多属于文本形态的经济思想文献。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些文献影响有限，不仅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更没有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② 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系统整理和研究，以全面展现中国经济学人对于发展经济学早期发展的贡献。

中国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原产地之一，它具备最早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独特的历史条件。首先，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农业国中经济学教育水平很高的国家之一，不仅在国内建立了仿效西方现代大学体制的高等教育体系，而且派出了大批留学欧美的高端经济学留学生向西方国家学习现代经济理论，他们不断将世界最新的经济理论输入国内，为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先进的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其次，中国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启动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与东亚的日本同时起步，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也是领先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和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艰难性、复杂性是世界各国所仅见的，这也为中国经济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思想动力和最良好的现实经济条件。

参考文献：

阿恩特，海因茨·沃尔夫冈，1999，《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

① 严格意义上来说，曼德尔鲍姆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罗森斯坦-罗丹的《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所研究的东南欧国家工业化问题，还不是真正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研究，至少不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研究。

② 比如世界上著名的《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有关“发展经济学”词条及西方人所著的发展经济学教材都没有中国人的名字。

- 陈伯敏, 1948, 《China's Economic Policy-Planning or Free Enterprise》(书评), 《社会科学杂志》第 1 期。
- 胡坚, 2013, 《张培刚传》,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李成、郝俊香, 2006,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发展与展望》,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迈耶, G. M.、D. 西尔斯, 1988,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 谭崇台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 谭崇台, 1993, 《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 王念祖, 2002, 《我的九条命——王念祖回忆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辛膺、《时代经济月刊》社资料室, 1948, 《时论选辑: (一) 中国工业化问题: 经济政策与工业发展》, 《时代经济》第 2 期。
- 易棉阳、赵德馨, 2017, 《中国经济发展学论纲》, 《求索》第 10 期。
- 张培刚, 2009, 《农业与工业化》(上),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组编, 2009,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第一、二届张培刚奖颁奖典礼暨学术论坛文集》,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邹进文, 2021,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在西方的反响》, 《中国社会科学》第 5 期。
- Aubrey, Henry G. 1950. "Reviewed Work: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by Pei-kang Cha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 (4): 366-367.
- Barton, Glen T. 1951. "Reviewed Work: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by Pei-Kang Chang."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4 (4): 621-622.
- Chu, Judy. 2003. *The Biography of Yuan—li Wu*.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Flores, Edmundo. 1951. "Reviewed Work: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Industrialized* by Pei-Kang Chang." *El Trimestre Económico* 18 (3): 575-578.
- Hobbs, S. H., Jr. 1950. "Reviewed Work: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by Pei-Kang Chang." *Social Forces* 29 (1): 97-98.
- Hsin, Ying. 1947.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Economically Undeveloped Countrie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Hsu, Francis L. K. 1950. "Reviewed Work: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Industrialized*. by Pei-Kang Cha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5 (3): 443-444.
- Kublin, Hyman. 1950. "Reviewed Work: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Industrialized* by Pei-kang Chang."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 (1): 87-88.
- Lockwood, William W. 1950. "Reviewed Work: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Adjustments*

-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Industrialized.* by Chang Pei-kang. ”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0 (1): 97 – 99.
- Loomis, Charles P. 1950. “Reviewed Work: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by Pei-Kang Cha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6 (1): 119 – 120.
- Morton, W. L. 1950. “Reviewed Works: *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by Marion J. Levy, Jr.;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by Pei-Kang Chang; *Frontier Land Systems in Southernmost China* by Chen Han-Seng; *Notes on Labor Problems in Nationalist China* by Israel Epstein; *Dragon Fangs: Two Years with Chinese Guerrillas* by Claire Band, William Band; *America’s Pacific Dependencies* by Rupert Emerson, Lawrence S. Finkelstein, E. L. Bartlett, George H. McLane, Roy E. Ja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5 (4): 357 – 359.
- Nicholls, William H. 1949. “Reviewed Work: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Industrialized* by Pei-kang Chang.”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31 (4): 746 – 747.
- Ou, Pao-san. 1948. “Capital Formation and Consumers’ Outlay in China.”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 Pan, Yu-pu. 1948.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and Capital Formation.” PhD diss., Illinois University.
- Rosen, George. 1950. “Reviewed Work: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by P. CHANG.” *Social Research* 17 (4): 522 – 524.
- Sang, Heng-kang. 1947. “The Mechanism of Capital Formation.”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 Scoville, Orlin J. 1949. “Reviewed Work: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by Pei-kang Chang.” *Land Economics* 25 (4): 439.
- Ting, Chen. 1945. “Industrialization, Capital Formation, and Internal Saving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ostwar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 Trescott, Paul B. 2007.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
- Vass, A. F. 1950. “Reviewed Work: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by Chang Pei-kang.”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67: 230 – 231.
- Wang, Samuel Nien-tzu. 1945. “Industrialization, Monetary Expansion and Infl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 Wu, Yuan-li. 1945. “Capital Formation and the Economic Order: An Analytical Stud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ase of a Poor Country).” PhD diss., LSE, Lond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ought in the 1940s: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Doctoral Theses of Overseas Students

Zou Jinwe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In the mid - 1940s, with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how to rebuild China's economy and how to realize industrialization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domestic academia, and also became the focus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f overseas economics students. At that time, overseas students studying economics in the west, mainly in the United States, made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based on their attention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lessons from Western frontier economic theories.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not onl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but also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economic thought, especially 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y are the most promine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made by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world economics since modern times.

Keywords: Overseas Students, The 1940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oughts

JEL Classification: B20, B31, O10

(责任编辑: 王姣娜)